

科幻研究通讯

NEWSLETTER FOR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主办单位：
中国科幻学会（筹）

第 1 期
2021 年 4 月 10 日

目 录

【论 文】

“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陈舒劼

评议人：李广益

【译 文】

科学的新诗学：论苏联“科学艺术文学”的建立

马蒂亚斯·施瓦茨（Matthias Schwartz），三丰译

【札 记】

后新浪潮时代的英国科幻热

吕广钊

【动 态】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Society of China

【论 文】

“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陈舒劼

摘要：科技之于人类共同体的影响既是当前的重要现实，也是中国当代科幻想象的重要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共同体时常是不动声色的主角，体现出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这批科幻小说对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恶意和善意两种矛盾的想象模式；而文明间恶意关系的认知又与既有的共同体理论产生了矛盾，即“黑暗森林”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矛盾。在善与恶两个端点之间，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还对科技介入人类共同体之后的复杂状态铺开多角度的想象。这些小说叙事在呈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走向的关注和忧虑之时，也期盼着更有生命力的批判性想象。

“从根本上看，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是根植于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1]。科幻小说的想象之花无论如何芬芳馥郁，终究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詹姆逊用以考察科幻小说的“未来考古学”，其方法论核心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2]，历史和未来以当下为中轴折叠起来。未来是拥有无限可能的星辰大海，还是必将趋于某种特定的状态，科幻小说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探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形态，大众对“现代性”“地球村”“全球化”等名词早已耳熟能详，人类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20年初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个生动的注脚。科技将把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带往何方？处于全球化发展与变化进程中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其想象已经在追问：如何理解人类作为共同体的存在？如何想象走出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状态？科技是导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3]的理想社会建设，还是最终激化人类之间或人类与其他文明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交流合作或不可共存是否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前景的两极？科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和现实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如何保持科幻小说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

—

问题总是从历史溯源开始。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萌芽之时，已经拥有强烈且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晚清之际，家国有累卵之危，仁人志士忧心如焚，小说正是时代的镜像。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使复活的贾宝玉亲眼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侵略者的蛮横，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让“潜水雷”“绿气炮”“气球队”等新式武器帮助中国大败西方列强，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则令中国人征服欧洲、占领月球和木星。这批晚清科

科幻小说毫不掩饰地展示中西、新旧间的冲突和复兴中国的渴望，无暇构想人类联合为共同体的场景。家国危机是此刻的主角，病毒、地震和外星屠夫还在等候出场。1939年顾均正的《和平之梦》，将对峙双方置换为美国和影射日本的“极东国”；1942年许地山的《铁鱼底鳃》描写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在战火中研制新型潜艇，却报国无门、为救潜艇资料而落水身亡。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幻小说，其共同体意识不是想象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方式或危机，而是希冀国人团结救亡。在今天，“共同体”已成为包含地理区域、地域性社会组织、共同情感和互动关系等特征的复杂概念，它通常被描述为两种类型：一是地域性类型，以村庄、邻里、社区、城市等地域性社会组织为代表；二是关系性类型，如种族、宗教团体、社团等社会关系与共同情感[4]。从《新石头记》到《铁鱼底鳃》，这批科幻小说叙事的重心，显然不在描绘社会学意义上的地域性或关系性共同体的生成。它们所体现出的对共同体的理解，更多是凸显小说叙事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努力建立作者与读者间的情感联盟，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共鸣。有研究者指出：“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5]鲍曼则将判断共同体的标准压缩到了共识的形成上，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精神统合体。要没有这种特性，根本就不算共同体。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会假定，首要的支撑就是共识，至少是达成共识的意愿和潜力”[6]。就此意义而言，这批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留下了沾着愤懑和屈辱写就的“我们”。

新中国的成立，将中国科幻小说带进了新纪元。借用胡风著名的长诗的标题来形容，“时间开始了”[7]。科幻小说中那个努力将作者和读者融成一个“我们”的叙事立场还在，但主色调已非屈辱和忧虑。1949—1966年，科幻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轻快而富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发明，这些发明涵盖航天、生物技术、交通、气象操控、电脑、农业、海洋科学、低温人体科学、医学等多个科学领域”[8]。普及科学技术、实现美好生活、建设独立富强的国家，新的科幻小说叙事基调在形成，而批判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是新基调的另一条主线。童恩正在1960年出版的《古峡迷雾》中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宣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欺凌。1963年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描绘了深海中日本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和警惕敌对势力的破坏，在1978年后科幻小说的短暂复兴中仍携手同行。叶永烈于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洋溢着奋发昂扬、自信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中的“未来市”就是“未来世”。与此同时，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1978）、王晓达《波》（1979）、刘兴诗《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延续的则是《古峡迷雾》和《黑龙号失踪》的主题。这批小说保持着鲜明的政治认同，“我们”是欣欣向荣的新生政权的主人翁、人民政权的保卫者或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者，从而加入了与时代政治氛围相契合的共同体意识生产。

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小说进入了新的文化语境。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中国逐步进入世界市场的竞争，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互联网技术日益深入社会生活，市场经济开始重构文学场域。历史的转折必然投射到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摆脱了科普论、社会现实论，企图寻求科幻文学本身的独立

存在价值，向科幻本体回归。”[9]科幻小说的共同体观念不再天然地依附时代思潮，而共同体已从滕尼斯、涂尔干、韦伯、雷德菲尔德、鲍曼等人的描述中继续发展，成为包含权力组织、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多种新元素，具有多种功能的功能性共同体，没有一个能够确切涵盖它各方面特征的统一界定[10]。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日趋复杂，出现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是全球碎片化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人类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境况也愈加明晰。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形成、如何运作，这些问题在加入科学技术的变量后更加令人着迷，充满问题感的共同体想象正徐徐展开。

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共同体想象发生的新变，根源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科学技术使人类大规模交往成为可能，吉登斯用“脱域”一词说明，社会关系能从地方场景中跳出并实现跨时空重组[11]，这使得“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共同体生产变得极为活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带来社会生活便捷的同时，可能进一步造成环境风险、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等问题的加剧。科技发展本身带来的负面效果，正被现实所证明，这不是哪个超级国家或超级英雄所能单方面解决的。想象人类文明危机及其克服方式，是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叙事重要的起锚点。

黑暗时刻总是出其不意地降临，这是科幻想象的特权和特长。外星智慧随时可以进攻地球并消灭人类，人工智能可能在某个时刻悄无声息地跨过意识自主的奇点，高致死性传染病或许毫无征兆地大规模扩散。于是，政府官员、银行高管、技术专家、超市销售、市井闲杂的身份差异不再重要，烈性病毒、眼放绿光的机器人和狞笑的外星人不考虑哪个地球人的银行卡里数额更大。大多数危机的爆发不以人类意愿为准绳，在灾难面前，形成有效的共同体无疑是人类增强抵抗能力的最佳途径。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在人类将被地外文明彻底消灭的背景中展开叙事，面对技术实力远超自己的外星文明，人类在漫长的自卫战中组成了不同形态的共同体，小说实际上可以看作针对外星入侵的一种社会形态反应。人工智能突变的隐患也是科幻想象的常见主题，从机械地接受指令到形成自主意识，人工智能不断挑战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王晋康的《生命之歌》、阿缺的《与机器人同居》、江波的《哪吒》、鲍浩然的《孤岛》等都涉及人与人工智能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可能。烈性传染病打散后的社会运行在王晋康的《十字》、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燕垒生的《瘟疫》中都得到模拟，这些小说多依靠人物个体的活动描述社会性的“战疫”，但人物身上又往往集中了个性选择与群体倾向的辩证关系，此时“不深究个人，就没有共同体的深度”[12]。更进一步说，共同体是许多科幻小说中不动声色的主角。

若以《三体》为例，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罗辑、叶文洁、章北海、程心、云天明以及维德等人物，或是“黑暗森林”“猜疑链”“宇宙社会学”等理论想象，而不会对小说中的ETO（地球三体组织）、PDC（行星防御理事会）、舰队联席会议、地球国际、舰队国际、PIA（行星防御理事会战略情报局）、未来史学派等各式人类共同体组织留下太深印象。《三体》的忠实拥趸所制作

的网络动漫短篇《我的三体》系列的前三部，可视为《叶文洁传》《罗辑传》和《章北海传》[13]，但没有也不大可能出现《ETO传》《PDC传》或《PIA传》。罗辑、章北海、叶文洁等人物比PDC等共同体组织拥有更为广阔的情感和性格表现空间，但根本上，主人公们的光彩夺目却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各种人类共同体组织的塑形。在人类社会灭亡的阴影下，这些官方或非官方的共同体以成员内心的价值共识为基础，依靠团体的凝聚力，从各方面影响并完成了人物。是谁将罗辑从玩世不恭、把专业等同于混饭吃的平庸学者塑造成了挽救人类命运的英雄？如果英雄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爱心与责任感，那么又是谁激发或唤醒了真正的罗辑？是PDC，主导面壁计划、满足罗辑所有的现实愿望、让庄颜去末日等待以彻底激发罗辑潜力的PDC。PDC是什么？一群面目模糊但目标一致的人组成的共同体组织。相同的逻辑也体现在章北海身上。章北海以其坚定却深藏的人类必败信念，提出并参加首批“增援未来计划”、锁定逃离地球的实施方案、暗杀可能阻碍其目标实现的重要专家、劫持“自然选择”号星舰逃离太阳系、成立星舰地球以保存人类文明的火种，这一系列行为使章北海成为星舰地球共同体的精神领袖，但这并不能作为共同体塑造章北海的反例。章北海所有的行为，都是“未来史学派”理念的实践。他的自述很清晰：“我不需要思想钢印，我是自己信念的主人。这种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不是来自我一个人的智慧。早在三体危机出现之初，父亲和我就开始认真思考这场战争最基本的问题。渐渐地，父亲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着深刻思想的学者，他们包括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他们称自己为未来史学派……他们所预言的今天的强盛时代，几乎与现实别无二致，最后，他们也预言了末日之战中人类的彻底失败和灭绝。”[14]章北海就是“未来史学派”这个思想共同体集中意志的体现。第三个例子是叶文洁。这位ETO的精神领袖，同样受制于ETO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即便是作为ETO的最高统帅，她始终要保持与这个共同体的对话而非简单地发号施令。而叶文洁之所以成为ETO的领导，又来源于她按下向太空发射地球信息的举动——一次长期遭受迫害后的爆发，因此真正将地球抛入危险境地的，是那群在特殊年代中习惯将他人置于死地的人，一个隐性、松散却又能量巨大的观念共同体。如果还需要第四个例子的话，那就是在PIA计划下被缩成一个大脑的另一位人类英雄云天明。涉及共同体因素的科幻想象，自然涉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包括《三体》在内的90年代以来的共同体科幻想象，都遵循这条铁律：“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人格个体”是“真正的共同体”的主体，“人格个体”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16]，二者形成辩证统一。

三

共同体是时常隐匿于主人公身影中的主角，这较容易为读者忽略。文明共同体之间如何相处，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想象的焦点。包含《三体》在内的众多文本参与了这一主题的印象。尤其是在地球文明走向宇宙的未来前景中，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升级版”，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的宇宙命运共同体是否有可能实现？王晋康《与吾同在》、韩松《医院》三部曲、刘慈欣《吞食者》、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黑暗的终结》《我的高考》和《安琪的行

星》、何夕《浮生》、江波《星落》、张冉《大饥之年》和《太阳坠落之时》、分形橙子《赞神的宫殿》、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王侃瑜《云雾》、索何夫《出巴别记》、超侠《利维坦之殇》等各有自己的理解。尽管这份名单还可以继续延长，但这批小说对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的想象，集中表现为对文明间关系或恶意或善意的认知模式。在这种简化关系的想象中，可以看出小说叙事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的不同理解。

零和！广袤的宇宙是最好的战场，从小说到电影再到游戏，星际战争的主题早已对受众的接受心理形成饱和轰炸。在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想象里，将宇宙间文明的恶意冲突推到极致的，首选《三体》。“黑暗森林”，这个建立在小说“宇宙社会学”理论想象之上的概念，以比喻的方式勾勒出未来人类所面对的险恶的宇宙文明环境：宇宙就像暗无天日的森林，任何先暴露自己的文明都将遭到不知来源的、干净彻底的毁灭性打击，歌者文明以二向箔随手抹去整个太阳系就是如此。“黑暗森林”逻辑贯穿了整部小说的想象，人类和其他宇宙文明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所有文明在意识到自己身处宇宙文明圈后，最重要的就是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人类文明开始了战战兢兢的时代，“黑暗森林理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那个篝火余烬旁的孩子，由外向乐观变得孤僻自闭了”[17]。只有光墓——彻底将自己封锁起来的技术，或许能向其他文明表明自己绝无外侵的雄心。

《三体》的“黑暗森林”模型拥有许多同行拥趸。索何夫的《出巴别记》将零和状态归因于本能：“作为一种天生的掠食者，人类的基因中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无法抑制的竞争本能……这个种族与另一个文明——无论这个文明与他们有多么的不同——和平共处的概率近乎为零……人类在这个宇宙中最为惧怕的不是天灾，不是疾病，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同类，而是那些身为‘非我族类’却像他们一样能够思考的存在。”[18]“非我族类”更像是“黑暗森林”理论的简略版。相比之下，宝树《安琪的行星》就迂回得多。小说有件动人的爱情叙事的外衣：大勇为安琪在宇宙中购买了一颗行星“ΣX-6470-2”，并将其命名为“安琪之星”，以虚拟技术再造的“安琪之星”景观打动了被他人抛弃的安琪。到他们的24代后裔勇哲凭借空间拟合技术登上这个行星时，勇哲为向长尾巴的外星姑娘夏丽示爱，不顾“安琪之星”上存在与地球高度相似的文明，而要按照先祖的美好想象来重塑“安琪之星”。“安琪之星”人将为此承受的灭顶之灾在勇哲眼里不值一提：“这些徒劳的生物，他们全然不知，自己和整颗行星的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至于上面的原生态系统……那只是一些顺带被清除的杂质而已。”[19]《安琪的行星》的特别之处是呈现了一种以爱为名的杀戮，宇宙间高阶生命对低阶生命的傲慢和冷漠，被“美”和“爱”这种炫目的辞藻所包裹，犹如钻石的璀璨可能遮掩了矿工的血汗。作为文明共同体间零和关系的补充，宝树的《时间之墟》还设计了一个每隔20小时左右就重启一次的时空场，人类间因此爆发无休止的相互残杀，直至再也无法想象出新的摧残生命的方式为止。人与人难以结成共识基础上的共同体，恰如文明间遵循零和逻辑一般。张冉的《大饥之年》似乎想给零和关系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致命真菌孢子的释放者安德鲁·拉尔森曾给自己立约：从下飞机的一刻起，若第一个对话的人怀有善意就停止释放真菌。个体对共同体是否能

达成的信念，直接影响到共同体的生成。结果这场带有偶然因素的试验又必然地失败了，小说同时暗示，人类和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零和的。

是否存在非零和的可能？另一批小说倾向于乐观地看待文明共同体间的关系。宇宙如此浩瀚，生命又总有时限，没有必要整日你死我活。分形橙子的《赞神的宫殿》正面否定“黑暗森林”，勾勒出类似人类文明导师的外星智慧形象。小说里的拉玛文明，虽然染有阿瑟·克拉克《与罗摩相会》中罗摩形象的印记，但比冷酷的罗摩文明热情多了。它们至少将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赐给人类自救的机会。原因何在？“至少就‘拉玛’的所作所为来看，宇宙的真实图景并不是黑暗森林那么简单……文明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文明，而是险恶的宇宙环境，严酷的低温、真空、星体撞击、一个超新星的爆发就足以摧毁一个文明，还有我们尚不了解的其他宇宙灾变……宇宙本身就是生命和文明最大的敌人。只有建立更广泛的合作，才能帮助文明更好地生存下去……合作很可能是唯一对抗宇宙的模式。”[20]江波《星落》中的布丁人更是受惠文明眼里善良的神，不仅无意控制或消灭弱小文明，还提供无智慧的星球以保存文明。“文明聚散，是星星间的常事，你无须为此担心。”[21]布丁文明施惠于人而不求回报，这份洒脱令人神往。善举多与爱心相随，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希望在“爱”的基础上构建“云网络”形态的宇宙文明共同体，“不同生命体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亘古以来都是宇宙间微妙而永恒的主题……对于所有发现云网络的智慧文明，云网络都欢迎其加入”。小说承认攻击和争斗总会出现，“一些心怀鬼胎的种族在成功驳入云网后暴露出贪婪的本性，不断侵扰别的种族，疯狂掠夺别族的计算资源，让云网充斥着艰险与争斗”，然而“云网中所有文明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提升之路，生命不应只是趋利避害的计算程序”，“云网络”有干涉文明间冲突的能力，但“是否懂得‘爱’仍是我们评判一个文明高低的首要标准”[22]。如果文明要自我提升，就不可能总甘于蜷缩在“黑暗森林”之中。

四

矛盾如巨鲸般浮出海面，它不仅存在于科幻小说的想象之中，还存在于文本想象和理论阐释之间。文明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确比充满善意的互助能演绎出更繁复的波折，然而文学上的精彩没有资格宣告想象的正确，恰如真善美可能有交集但无法彼此替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就人类/宇宙命运共同体的可能给出了两种不可共存的想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共同体文学想象又与共同体理论推演产生了矛盾。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习近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指向的是与“黑暗森林”迥异的、充满生机与光明的人类未来。

马克思将共同体理解为人类进行社会交往的方式，共同体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伴随着人类发展而变化。只要人的社会属性不变，人类就总会体现为某种共同体状态。马克思在人的状态由“未异化的局部发展的依赖关系”到“异化的普遍发展的依赖关系”，再到“剥去异化且全面社会化了的依赖关系”的三阶段上，对应性地将共同体的历史形态归结为“本源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阶段[23]。“自由人联合体”意味着克服资本主义抽象而虚幻的共同体，意味着将人和人的关系从市场竞争的你死我活状态中解救出来。《共产党宣言》强调：“代替那存

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4]人终将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体，而不是陷入猜疑、争斗、杀戮的循环，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揭示。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5]，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马克思主义及其在21世纪的新发展，提供了有别于从滕尼斯到鲍曼等人的共同体理解。“黑暗森林”式场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观照下，逐渐暴露出自身想象的裂缝。

“黑暗森林打击都有两个相同的特点：一、随意的；二、经济的。” [26]在《三体》的“茶道谈话”中，掌握宇宙智慧文明许多秘密的智子，曾如此总结高阶文明的攻击方式。可这两个特点有明显的矛盾：彻底的“随意”是不考虑“经济”的。智子强调“所谓经济的，是指只进行最低成本的打击，用微小低廉的发射物诱发目标星系中的毁灭能量” [27]，在本质上，“黑暗森林”打击是“经济”限定下的“随意”。经济意味着什么？一般意义上，经济被理解为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包含对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和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28]，“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 [29]。没有脱离人际交互活动的经济，交流即是选择。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经济学做出一个著名的限定：

“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所表现的形式。” [30]“黑暗森林”打击的存在本身、尤其是它对“只进行最低成本的打击”的本质性强调，已经确证了这种打击必然要遵循特定的经济规律，从而是某种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价值选择。这与人类的战争经验并无二致。“人类战争的发端都是经济原因，打仗的根本目的都是要争夺人口、财产和土地资源的控制。不论军事斗争的手段怎样千变万化，这个根本原因却是从古至今始终如一。” [31]宇宙间的文明共同体，在根本上仍要遵循人类间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规律。距离的超远可以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得到克服，《三体》已经表明，现有科学认为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也可能被文明所改造。另外，宇宙虽大但物质总量仍有限度，这与地球资源整体上的有限性也是一致的。将“黑暗森林”打击推演到底的后果就是宇宙不断降维，无可挽回地滑向文明的同归于尽，更何况“低维的资源对高维没有用” [32]。那么，频繁发起打击，对与低阶文明同处一个宇宙的高阶智慧而言，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文明发起的攻击，总会受到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那些因素的限制。交流、协商、合作，比猜疑、争斗、毁灭更赢得人心，这是人类文明演化所昭示的道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形成的论断众所皆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3]沿着这条路径，赖特在《非零年代》中提出，人类历史发展总体朝向“非零和”规则上的日趋复杂的变化：“新科技产生，引发或容许新的、较丰富的非零和互动，接着（基于人性中显而易见的原因），社会结构跟着演进，实践这项丰富的新潜能，将非零和互动转化为正面的综合，最后使社会的复杂性更为宽广，也更为深

邃……人类的生活终于深植于互相依存的更大更丰富的网络中。”“从头到尾，人类的命运就是让彼此的命运越来越密不可分。”[34]《赞神的宫殿》等“黑暗森林”模式的反对者，就将未来的想象建筑在这种理论的推演上：“人类最开始是通过简单的血脉组成的家族进行个体合作，众多的血脉家族组成了更大的部落，部落组成了更大的部落联盟，文化认同又让我们组成了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合作组成了联合国，现在我们正走在更紧密的合作这条道路上。而现在，我们知道了还有更大的合作可能，从不同的星球上发展出的不同的文明可以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共同对抗严酷的宇宙。”[35]而鉴于“黑暗森林”打击最终玉石俱焚的结局，名为“归零者”的高阶文明终于在《三体》的尾声阶段登场，号召各文明将为躲避零和打击而构建独立小宇宙的质量还回大宇宙，以避免大坍缩的宇宙末日降临。“归零者”试图重启宇宙、回到宇宙田园时代的愿望和努力，更像是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宇宙共同体的实践。“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36]当然，在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宇宙智慧共同体的航线上，仍是波诡云谲。

五

科技拥有的塑造未来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能量无人能忽视，无论对此前景持乐观或悲观态度，科技都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像法律一样统治着我们。它不仅塑造着我们的物理世界，也塑造着我们居住和行动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环境”[37]。善意或恶意的文明共同体关系，只是位于想象两个端点上的极致状态，善意和恶意之间巨大的空白，留给科技介入社会文明后可能产生的复杂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已经注意到，科技介入后的技术统治、智力区隔、人机结合，都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状态。相比于未来命运共同体可能与否的整体想象，这些想象的维度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共同体某种具体的状态及其隐藏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未来共同体建设面临挑战的思考。

张冉的《太阳坠落之时》讨论了将技术本身作为人类未来社会基础的可能性。如果彻底地依靠技术来运行社会，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里，技术“成为城邦文明之间的等价交换物”，“经济行为依托于技术发展”，“人人都是城邦技术集合体的组成部分”[38]。怀揣着这个共同体理想的“特里尼蒂”组织最终没能实现他们的技术乌托邦理想，但毫无疑问，将未来人类发展的重任都放在科技的肩上是一类流行的想象。技术如何成为等价交换物，什么样的技术能成为等价交换物，此类细节的缺失让未来共同体的想象黯淡许多。与此同时，技术成为“恶托邦”源泉、形成专制型共同体的担忧也始终在场。张冉的《以太》中的“手指聊天聚会”组织，以触觉接触的方式反抗“以太”技术监控下的共同体社会；超侠的《利维坦之殇》在霍布斯的“利维坦”理念上塑造了一个外御强敌、内控人民的无所不能的巨型机器城市，生活在这个安乐共同体中的代价是自由意志的丧失。技术可否被替代？宝树的《我的高考》就试图将智力作为未来共同体的运转轴心。“新制度是严格按照智力区分的等级制度，不同智力阶层之间不相互侵害，但是却拥有不同的政治权限。原来的人类和低阶的智力提升者无权进行统治，而必须绝对服从高阶者的命令，如同

儿童要服从大人。” [39]然而，以智力区隔出阶层并施行统治的制度，同样无法摆脱技术的身影。如果仅仅依靠技术或智力的单方面力量来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必然要简化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

将人与机器融为一体的赛博格，正是体现共同体建构复杂性的一片疆场。唐娜·哈拉维指出：“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 [40]赛博格搅乱了建立在身体之上的人类感觉经验和知识系统，“我是谁”及其引发的问题愈加扑朔迷离。顺着唐娜·哈拉维的视线，赛博格挑战稳定的身份认同、突破清晰的边界意识、引起认识的混乱与冲突。“赛博格神话是有关边界的逾越、有力的融合和危险的可能性”，“我们几乎不能期望得到关于反抗和再结合的更有力的神话” [41]。更艰难的境况、更尖锐的追问，才能更真实地面对人类共同体的未来。陈楸帆的《荒潮》，正是包含了赛博格等多种因素在内的未来共同体模拟。小说叙述处处引人生疑：硅屿的各方人士，根本不在意摆在面前的改善命运的机会；快到21世纪中叶的硅屿社会，仍保留着宗族制度；数码科技和虚拟技术极为发达，而巫术和非自然现象同样大行其道，有批评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发现许多文学社会学的介入视角。硅屿固化成镇区和村区两个对抗的空间和阶层，丛林社会是硅屿各方默认的行为准则，外骨骼机器人成为鬼神存在的标志，小米由垃圾人变为赛博格并分裂出“小米0”和“小米1”两种意识，义体增强躯体的快感生产又重组身份认同，历史作为叙事的记忆在数据服务的介入下走向消亡，这一切几乎都在摧毁既有的共识。硅屿的土地上好像无法眺望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

历史总是在克服矛盾中前进，因为未来共同体建构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而放弃构建共同体的努力，既是理论的怯弱也是想象的偷懒。在一些未来的想象中，文明个体间只剩下意识或能量的交流，这多少回避了共同体建构的复杂性。何夕的《浮生》认为人的躯体终将消失，生命间的交流仅以能量的形式存在，“合作早已失去意义” [42]。与此类似的是，未经矛盾的克服而直接宣告共同体在未来的实现。如宝树的《黑暗的终结》描绘八百万个智慧种族达成了一致、完成了从形体到政权的统一，从而“永远终结了各种族、文明、智慧体系之间的冲突，再也没有对资源的争夺，再也没有敌意和仇杀，再也没有陷阱和诡计。宇宙成为了我/们，我/们也成为了宇宙本身” [43]。浓郁的乌托邦更多地反映出愿景，而非对问题的深度认知。归根结底，该怎样激发想象未来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

六

必须回到现实的重大问题中来。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旨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向的，正是弊端累累的资本主义全球治理术。“全球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场深层次危机，这场危机既涉及棘手的结构层面，即积累过剩的危机，又涉及政治层面，即合法性或霸权的危机，这场深层次危机几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普遍危机。” [44]资本逻辑是世间苦难的根源，同样渗透到未来。宝树在《人人都爱查尔斯》中突出

强调了资本无远弗届的力量，依靠脑波传递技术吸引了数量庞大的观众的查尔斯，其飞行技术、运动装备都受控于资本的利润生产。一旦查尔斯想要回归个人生活，资本的代理人立即发出警告：

“这些公司和机构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说有一个幕后大老板，那既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资本本身。你是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但绝不是独立的。” [45] 查尔斯希望挣脱资本掌控下的虚拟共同体、重回真实生活，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论是聪明的大脑还是先进的技术，资本都能收编；无论是狂热的拥戴还是忠诚的痴迷，都可能受制于资本的驱使。资本主导的包括技术与智力在内的诸多因素走向唯利的共谋，给人类未来命运蒙上巨大的阴影。尤为重要的是，“尽管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存在普遍的玩世不恭，但没有其他任何世界观达到接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力量或实际成就的程度” [46]。资本主义早已拟就一套自我神话的剧本，如塞壬的歌声般迷魅而危险。

科幻小说的未来共同体想象，必须能跟得上资本主义编写神话的想象力，更应当警惕极具变革性能量的科技被资本所收编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过程中同步生产的意识形态幻象。《荒潮》警告说：“那个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排异与歧视以更加隐蔽虚伪的方式进行。” [47] 这种警惕不主张退回到自然时代，而要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拾批判的武器，追问“观念从何而来，又为谁服务”，无论它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 [48]。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已经充分展示了其改变世界的的能力，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不断突破，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都处于变化的进程中，共同体建构的变数也在骤然增多。是在发展中迎接更多的构建新共同体的挑战，还是安于既有的稳定的小共同体生活？刘维佳在《高塔下的小镇》中就设置了这样一组共同体发展时所面临的矛盾：在自动电磁大炮保护下过了三百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与外界隔绝的小镇居民，是选择危机重重的前行之途，还是安于现状？女主人公水晶在目睹了黑鹰部落为发展而进攻小镇却被电磁大炮屠杀殆尽后，仍然跨出电磁大炮的保护圈，是因为她坚信只有超越和进化才孕育着希望。“现代共同体构建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实现对于传统的‘共同体’和‘社会’概念的批判超越——即通过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联系，实现大范围的个体有机整合。只有通过这种超越，一个取代旧有联系网络、融合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49]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是批判精神的复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50] 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前景，并不是对人类未来的细笔精描。“共产主义存在于人们抵制资本主义、争取自主空间的每一处……存在于对可替代选择的希冀中，体现在人们与资源、所有权、财富、知识、食物、住房、社会保障、自主决定、平等、参与、表达、健康、准入权等各种贫困类型的斗争之中。” [51] 在种族、阶层、性别等维度上，需要跨过的共同体沟壑还有很多。为共同体建构而斗争，恰是科幻小说想象未来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所在，也为科幻叙事从“实然”描绘到“应然”想象提供了最好的武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

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52]自由与和谐的统一将在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而科幻叙事必然卷入这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之中，宛如人类迈向星辰大海。那就让批判性的想象从当下再次出发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53]

注 释

[1]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英文原版序”，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9页。

[3]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概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形容这是一种“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页）。

[4][10] 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会》，《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5] 张志旻、赵世奎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年第10期。

[6] 齐格蒙特·鲍曼：《社会学之思》，李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7] 《胡风的诗——〈时间开始了！〉及〈狱中诗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8] 吴岩：《十七年科幻小说创作综述（1950—1966）》，姚义贤、王卫英主编：《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第1册，科学普及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9] 杨鹏：《科幻类型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1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2] 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13] 张七：《从〈三体〉到〈章北海传〉》，《北京晚报》2020年3月25日。

[14]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354页。

[15]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6] 侯才：《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7][26][27][32][36] 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第221页，第221页，第205页，第509页。

- [18] 索何夫：《出巴别记》，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金陵十二区》，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66—167页。
- [19] 宝树：《安琪的行星》，《时间外史》，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49—252页。
- [20][35] 分形橙子：《赞神的宫殿》，程婧波等：《冷湖II·宿主》，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2—473页，第473页。
- [21] 江波：《星落》，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再见哆啦A梦》，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50页。
- [22] 谢云宁：《太阳知道答案》，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成都往事》，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268、265、269、279、269页。
- [23] 徐斌、巩永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表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
- [25]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 [2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
- [29]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43页。
- [30]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9页。
- [31] 徐焰：《战争与经济》，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 [33][5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第571页。
- [34] 罗伯特·赖特：《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前言”，李淑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5页。
- [37] 希拉·贾萨诺夫：《发明的伦理：技术与人类未来》，尚智丛、田喜腾、田甲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 [38] 张冉：《太阳坠落之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编：《太阳坠落之时》，万卷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71页。
- [39] 宝树：《我的高考》，《太阳坠落之时》，第254—255页。
- [40][41] 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第325、327页。
- [42] 何夕：《浮生》，《再见哆啦A梦》，第212页。
- [43] 宝树：《黑暗的终结》，《时间外史》，第62页。
- [44] 威廉·I. 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超越特朗普的炒作》，赵庆杰

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

[45] 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金陵十二区》,第252页。

[46] 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47] 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34页。

[48]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2页。

[49] 刘伟、王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50]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5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科:《导论:马克思归来》,张韵译,福克斯、莫斯科主编:《马克思归来》上卷,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5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4页。

原刊《文艺研究》2021年第三期

评议人：李广益

最近一两年，以《“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为代表，陈舒劼发表了一系列科幻研究论文。作为成名学者，陈舒劼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揭示了当代中国科幻的若干重要面向，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新兴文类的认识，但在科幻研究领域引起的学术回应还不充分。本文试通过对于陈舒劼新作中一二关键点的推敲，展开对话，以推动学术交流、深化相关研究。

舒劼以“命运共同体”为抓手，一方面呼应了当代中国政治动向，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科幻文类的独特属性，而这点是容易因为这一关键词与官方表述的吻合而被忽略的。作为崛起于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新兴文类，科幻小说的一个极其独到之处，就是秉承现代科技形构的世界观、宇宙观，对人类进行全景观照和想象。近期西方科幻以至广义人文研究的若干主题如“后人类”“人类世”“人工智能”，无不与之相关。这些前沿议题，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强烈的引领作用，由近年各类学术期刊目录和各种学术会议议程一望即知。相比之下，同样体现了人类视野和天下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科幻研究者却较少阐发，仅在《流浪地球》成为票房爆款后才有所关注。

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原因。作为立论不久的官方政治话语，其阐发工作更多地交给了特定机构和学科，而在更广泛的学术界，对此感兴趣的也多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不过，不仅“共同体”（community）一词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命运共同体”也并非首创，而冠以“人类”之名，更是接上了源远流长的“天下”思想，总之这个组合概念具有相当大的观念和学术深度，或者说提供了相当大的论述空间。比起往往只能抽象地谈论人类共同命运的主流文学（或许更应该称之为“中流文学”），以创造和描绘“世界形象”和“种族形象”（刘慈欣语）为特色，并具备强烈未来意识的科幻文学，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或者借用舒劼的表述来说，中国科幻小说尤其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早已遍布“人类命运共同体”想象，只不过此前的研究者缺乏从这个角度展开的意识而已。《“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一文，因此具备重要的开拓意义。

但具体看舒劼的行文，不能不说有一些令人困惑的地方。在标题、摘要和论文的导言部分，连续出现了“命运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法，以及“作为共同体的人类社会”“人类作为共同体”之类的表述，大体上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形态。这些“共同体”能否等价，这里不做辨析，至少从这里的修辞以及上下文来看，文章关注的是普天之下的整全人类，而不是一国一域。在我看来，这是值得赞赏的立意。可是到了论文主体部分，“共同体”就变得漫无边际，大到奋起抵抗外星人入侵的人类社会，小到城市、村镇、社群，规模参差不齐；从地域、宗族、血缘的共同体，到思想、观念、情感的共同体，林林总总。一个有点极端的例子是，“叶文洁之所以成为ETO的领导，又来源于她按下向太空发射地球信息的举动——一次长期遭受迫害后的爆发，因此真正将地球抛入危险境地的，是那群在特殊年代中习惯将他人置于死地的

人，一个隐性、松散却又能量巨大的观念共同体”。

如果这样一个“隐性”（所指不明）、“松散”（边界不清）、一致性存疑（因为是观念性的）的群体也能进入“共同体”的序列，那么舒劼笔下的“共同体”实可谓无所不包。只是这样一来，这个概念简直可以指涉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群体、团体、组织，从而因其过大的外延而失去了分析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想象和呈现规模较小、层级较低的共同体，这就不是科幻的特色或特长了。由于引领作者视线的宽泛概念包含了过多的层级，这篇论文虽可游走于数量庞大的当代中国科幻文本，却难以聚焦，从而无法实现开篇标举的雄心。

至于何以如此，或许论文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可以部分地充当解释。论文第一节是对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科幻的回溯，为后文论述提供铺垫。这一节开头指出，“命运共同体意识并非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中国科幻小说在晚清萌芽之时，已经拥有强烈且富有时代气息的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概略列举《新石头记》《新纪元》《新野叟曝言》中“复兴中国”的想象之后，舒劼断言，“新中国成立前的科幻小说，其共同体意识不是想象人类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方式或危机，而是希冀国人团结救亡。”很遗憾，这个“暴论”不能成立。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中，天下关怀、大同思想和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经常是一体两面的，尤可见于和上述作品大体同时问世的《新年梦》（1904）、《梦想世界》（1906）、《电世界》（1909）等重要篇章。或许包天笑的《梦想世界》识者不多，但蔡元培的《新年梦》和许指严的《电世界》是中外学者早有详细论述的。同样，在讨论“十七年”时期科幻文学的时候，舒劼遗漏了与论文主题高度相关、并且也有学者讨论过的《火星建设者》（1957）及其长篇改写版《战神的后裔》（1984）。这些令人费解的缺失，使得第一节给人这样一种印象：1990年代之前的中国科幻文学念兹在兹的是“家国共同体”，这之后的科幻小说中的共同体观念“不再天然地依附时代思潮”，从而无法确切地界定。这样的科幻史叙事既不准确也不必要，因为蔡元培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在讲“家人、国人、世界人”，而点出晚清科幻与当代科幻遥相呼应的“天下情怀”，不是更能体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回到题眼，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流行于国际学界的“人类世”“后人类”等概念都包含着人类整体意识，并且都是高度政治性的，但后者更多地关联着身体政治、生命政治、环境政治，而前者的创制和传播方式决定了，对这一概念的诠释应该兼顾“国家间政治”的现实语境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图景，最重要的是保持政治思辨的宏观尺度。以这一考量为前提，中国科幻文学数十年来的积累提供了足以支撑相关议题的丰富材料，但研究者仍然需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准确采撷、细致分析，以释放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文本所蕴藏的认知和创造能量。

【译 文】

科学的新诗学：论苏联“科学艺术文学”的建立

马蒂亚斯·施瓦茨（Matthias Schwartz）

三丰译

20世纪60年代，瓦拉姆·沙拉莫夫（长篇小说《科利玛故事》的作者）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苏联古拉格最著名的文学见证者），一再坚持地提出，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文体”。在他看来，需要一种新的“纪实”文学来书写大屠杀和古拉格的重要经历[1]。如今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是，大约30年前，在他1929年至1931年第一次入狱后、1937年第二次被捕前的极短时期内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沙拉莫夫曾自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文体”的热情支持者：所谓的 *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这个词来自俄语的“小说”术语（*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可译为“科学虚构文学”，也可译为“科学艺术文学”（中文语境下的“科学文艺”）。因此，包括沙拉莫夫在内的所有该术语的倡导者都强调，不仅要坚持“虚构性”（*khudozhestvennost'*），而且要把“技巧”或“艺术”（*iskusstvo*）——“艺术”品质——作为新文体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要素，新文体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1934年12月第一届全联盟作家大会结束后，沙拉莫夫立即在《阵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与小说》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创造这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文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章要求：

想象一下，你自己是一名作家和科学家的集合体（当每一位文学家都是“专属于”一个特定的科学领域时），正在创作一部关于我国未来、世界未来的巨著。每名作家和科学家都为这个项目贡献了自己的幻想和自己的知识，构建了他的那部分共同的不朽建筑。多么宏伟的建筑啊！多么耐人寻味的精心栽培之作。创作一部科学小说作品，塑造读者的科学世界观，这是多么超前的规划啊！……在我们国家，科学和艺术不是目的，也不仅是知识的工具，而且是改变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苏联小说的任务是改造人，也即改造读者。[2]

沙拉莫夫没有预料到自己将来会被监禁，他显然从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中看到了重新进入苏联文学界的机会，并协调他个人经历和职业兴趣，以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斯大林社会的新社会要求，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那样，号召作家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3]。

但是，沙拉莫夫所寄予厚望的这种现在几乎被遗忘的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类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重构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的条件，促使马克西姆·高尔基和当时著名的儿童读物作家萨缪尔·马沙克在第一届全苏作家大会召开前夕，推出了这个复合词——*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并创造了一种位于文学小说和科学报道交叉处的新文学类型。在强调围绕这一文类的主要论点时，我将阐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确立为文学创作的唯一美学理论的过程中，它的构成是多么困难和有争议，以及为什么直到战后才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

流派。在最后一节中，我将分析这一文学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的特点，然后再简单地回到一个比较概括性的结论，并对解冻时期以来这一文体的稍稍复生进行考察。

战时：反对“趣味科学”和“科学幻想”

大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通常被描述为苏联历史上的乌托邦时期，当时众多的政治活动家、艺术家和作家建立了实验性的“梦想实验室”，以新人类、多样化的前卫艺术和科学创新来发展创造美好世界的乌托邦思想和科学构想[4]。相比之下，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则被描绘成一个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规模恐怖和压制一切乌托邦方式下的审美统一的时代[5]，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战争间歇期科学发展和文学想象的相互关系，情况就开始显得有些矛盾和复杂。

一方面，在1920年代，在广泛的科普写作领域，许多出版商、编辑和作者在受到一些限制的情况下，继续着革命前时代的“文明使命”，即通过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教育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富裕、更公正的社会[6]。雅科夫·佩雷尔曼可能是这一领域最著名的作家。他以记者的身份在《自然与人》（1890-1918）等大众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是最早报道火箭先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人之一。佩雷尔曼关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册子《星际旅行》于1915年首次出版，并被证明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年里重印了十次[7]。佩雷尔曼于1919年创办了苏联第一份大众科学杂志《在大自然的实验室里》，并继续撰写各种科学主题的“趣味性”教育书籍。在他的畅销书《趣味物理学》于1913年问世后，又有10种类似书名的出版物问世，如《趣味几何学》（1925）或《趣味天文学》（1929），印数达数百万册[8]。这套丛书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激发了无数的模仿者，例如由地球化学家、矿物学家和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斯曼撰写的《趣味矿物学》（1928），到1953年已经重印了24次[9]。这些小册子和类似的小册子、文章和教育作品试图以“简单而激动人心”的方式介绍科学，并以历史轶事、奇怪事件、悖论、谜语和笑话来吸引读者[10]。

与这一广泛的大众科学话语领域密切相关，事实上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是所有不知疲倦的实验者和科学创新者，他们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或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之后，试图在自己的学科中实现革命性的突破，他们渴望世间的长生不老、行星间的太空旅行或自我延续的生命力[11]。这种科学热情弥漫着强烈的乌托邦主义，使19世纪乐观的进步信念得以延续，这种精神与新经济政策时期（1922-28）苏联社会各个层面所面临的日常问题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涉及现代性和工业技术进步的破坏性后果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普遍恐惧的冒险小说体裁，也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12]。《世界探路者》《知识就是力量》和《冒险世界》刊载了无数的故事和连载小说，内容涉及疯狂的科学家、畸形的发明和技术革新。这些发明和技术革新非但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引发了战争冲突、无情的剥削或残酷的镇压。今天，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的小说《世界主宰》（1926）、《空中之战》（1928）和《卖空气的人》（1929）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小说作品，讲述了技术科学进步的迷人和可怕之处，这些作品大多以荒诞的方式实现[13]。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股广泛的大众写作中，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观点即使有，也只是在情节的最后展现，而不

是作为科学进步原本固有的东西出现[14]。

但是，在这两种主流倾向——一方面是相当乌托邦的通俗科学文学，另一方面是相当荒诞的虚构冒险文学——之间的某个地方，来自“相对较小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少量前卫艺术家宣称，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机械化的最新成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至上顶峰”[15]。形式主义者将进化论的思想融入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未来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受科学公式的启发，梦想着人与物之间的新关系，并提出了关于如何彻底重塑私人生活和工作生活领域的革命思想；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倡导者在1917年组织了Proletkult，宣称流水线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准[16]。这些前卫的艺术家和活动家希望对艺术和生活进行革命，虽然他们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无论是在工厂工作的人还是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人，都没有给予他们多少鼓励。

在1927年12月党的十五大之后，所有这些异质性的倾向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联合反对派”在这次大会上有效地终结，旨在实现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32）也得到了批准。首先，在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中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Proletkult）的支持者赢得了对反对派团体的暂时胜利，其后果是一个极富论战性和政治性的时期，在解释和出版的特权方面出现了严厉的批评、严格的审查和文化摩擦。

这种所谓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娱乐性科学”的大众化，因与社会主义建设工地的日常工作相去甚远而受到严厉的抨击。但冒险小说也完全被当作“反革命违禁品”而被抛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幻想”（nauchaia fantastika）（在此之前主要由商业界而非文学界使用）被一些评论家和作家引入，作为冒险文学或纯幻想的替代。它是一个有用的术语，用来强调该文体在科学概率意义上“现实地”处理科技创新和社会主义进步的未来结果的倾向。虽然这个词受到了极大的争议，但这个词就这样被确立为苏联形式的“科幻小说”的体裁描述[17]。

然而，随着经济和农业部门的强行重建所带来的第一个灾难性后果变得明显，而且RAPP的努力也明显地打击了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而不是激励他们承受五年计划的巨大负担。因此，在1930年代初，党再次改变了文化政策。它解散了RAPP和许多其他组织、私人出版社和期刊，以期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控制的文学和新闻生产领域。新政策在1934年秋达到了高潮，召开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第一届全苏作家大会。

我们不去详细复述这次文学政策的重新调整所产生的不同的、部分是破坏性的后果，但在大会召开前的生动辩论的结果之一是，高尔基与马沙克一起提出了“科学艺术文学”（nochno-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一词。两人预示着这个词是对一种新的文学的描述，这种文学可以把低级科幻小说的娱乐性因素、科学普及的教育性优点以及为社会建立新的“科学”世界观的艺术和思想任务融为一体[18]。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中，高尔基和马沙克提出了关于大众新文学的想法——特别是针对儿童的，但成年人也感兴趣的新文学[19]。马沙克在作家大会上关于儿童文学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这些公开辩论的结果，他把这种方法定义为对现实的“新认识”。

他们没有把自然、人类和道德表现为一成不变，而是努力向读者展示各种现象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并对世界进行充满激情和明确的描述，使人们感到有必要去抗争，去重组生活和自然。[20]

就写作本身而言，作者要避免抽象的、“娱乐性”的智力游戏或“不切实际”的冒险情节，而要回到“真实生活的轨道上”，然后作为参与观察者，在生活的实验室里有所发现[21]。马沙克只称赞了他的弟弟、高尔基个人最喜欢的伊利亚·马沙克（笔名米·伊林），认为他正是这种新文体中最有才华、最成功的宣传家。如今，他的名字大多已被遗忘，甚至在苏联文学和科普文学专家中也是如此[22]。但伊林生前是苏联发行量最大的作家之一，共出版了269本俄文版和译文版图书。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鲍里斯·利亚普诺夫（Boris Liapunov）指出，他的作品以大约40种语言发行，总发行量达到近5亿册[23]。他以1930年出版的《伟大计划的故事》赢得了声誉，该书第一年就多次印刷。该书叙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声称的和预期的成功，并突出地描述了它的光辉前景[24]，甚至连书名在“科学艺术”文学意义上说都是程式化的：叙事方式不叫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文论或素描集，而叫 rasskaz，意思是虚构的“传说”或“故事”，甚至都不被认为是报道“实际的”现实[25]。

因此，在作家代表大会上，马沙克提出了一个概念，即作为一种文体的概念，以替代以前的“娱乐性”科学文学，以及替代冒险写作和科幻小说（科学幻想）。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可怕的消极后果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而未来则被描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科学家与艺术家、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人类与机器、工作与休闲、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集体。

同时，这一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邀请前卫派和前“无产阶级文化”作家把他们的一些核心方法和艺术主张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美学中来。这种类型的典型情节并不是围绕着杰出的科学家或独具匠心的发明家展开，而是围绕着为实现科学突破而设计的可选创意和实验环境。当谢尔盖·特雷蒂亚科夫这样的前卫作家要求写一部“事物传记”时，科学文艺作家们就以《发明历险记》这样的作品来回应，这是该类型最典型的图书之一。该书由亚历山大·伊维奇（Ignatii Bernshtein 的笔名）撰写，1930年出版，到1939年又修订版重印了两次，它的开篇“乌托邦与真理”以埃德加·爱伦·坡的《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1845）的缩写版开始。在这个故事中，山鲁佐德讲述了水手辛巴达又一次不平凡的旅程，他先是遇到了一艘蒸汽船，然后是热气球、一台铁路发动机、一部电话、一台电报机和一台打字机。但山鲁佐德的故事讲得越多，哈里发就越不相信她，在厌倦了她的“荒唐的”、“荒谬的”、“荒谬无稽的”“胡言乱语”之后，他在第二天早上判处她死刑[26]。伊维奇解释说，一个充斥着十九世纪发明的故事对古代的听众来说是不可信的，因为人们只能想象他们从已知想象得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把他们能够从自己的时代想象出来的东西，在数量上加以放大，并把它们作为“拙劣的预想”（plokhye predvideniia）投射到未来：根据伊维奇的说法，他们无法设想任何根本上、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伊维奇接着认为，与哈里发一样，即使是“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H.G.威尔斯在1922年称列宁为“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也是错误的，因为

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中，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变革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伊维奇指出，即使是“最杰出的奇幻作家埃德加·坡”，尽管他有着丰富的幻想能力，但他也彻底错了，因为他没有向前看一千年，而是常常落后于自己的时代[27]。

在科学文艺流派的倡导者看来，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以前难以想象的对未来的质的飞跃已经在发生，文学的任务就是要赋予这些伟大的乌托邦以想象的形态，不是作为可怕的“科学幻想”，而是作为令人信服的、真实的“科学小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希望全国各地的大工地能把中亚的沙漠变成繁华的绿洲，把西伯利亚的荒原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和农产品。但是，这些乌托邦式的“发明冒险”就好比易于运输、极其耐用、由太阳充电的强大电池的憧憬，或者是远距离心灵感应的梦想[28]。

在审美集中化和同质化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政治中，1934年和1935年的文学和文化活动家们抓住了这一文体，并将其视为典范。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会阅读，他们积极向书籍和杂志的出版商推销这种文学作品[29]。在作家大会之前、期间和之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作家都表示支持这一新的文体，正如著名的电子专家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拉皮罗夫·斯科布洛所希望的那样，它应该激发“对科学和技术的热爱”[30]。因此，不仅瓦尔拉莫夫，而且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费多尔·格拉德科夫等作家也在杂志特刊上提倡这种新类型的小说[31]。

这种新的类型只有一个真正的缺点——它不能吸引读者。相反，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人，包括在校学生，更愿意继续阅读娱乐性的科普读物，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阅读老式的悬疑科幻小说。此外，几乎没有作家愿意写这种类型的作品[32]。少数愿意写这种类型的作家有康斯坦丁·鲍斯托夫斯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和前面提到的米·伊林，他们在整个30年代都在不懈地试图建立这种新的类型[33]。然而，来自教师、图书馆员和出版商，还有科学家和学者的抱怨源源不断，他们希望有一些不那么枯燥的东西可读。因此，在1936年高尔基去世后不久，有关方面就决定取消“科学文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典中所宣称的核心作用[34]。

战后时期：纯文艺文体的幻象

1939年秋，著名的科学教育刊物编辑和作家列夫-古米列夫斯基对他的批评家们感到失望，他把正在进行的对传统科普作品的争论总结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幻象”的争夺。

尤其是科普文学，和其他所有形式的文学一样，都有自己特定的幻象。在这些幻象中，有一种坚不可摧的幻象脱颖而出，即宣称必须将一本教育书塑造成一种纯文艺的形式，以保证其情感上的吸引力。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纯文艺化”。[35]

这种“纯文艺化的幻觉”与新“科学文艺”的追随者就如何写出高尔基在十年初所倡导的科普作品所提出的主张密切相关[36]。虽然在高尔基去世后它被推到了幕后，但这一文体从未真正消亡。“纯文艺化”一直与琐碎的科普作品能够转化为成熟的文学小说的希望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这一

文体在战后时期获得了惊人的回升。早在1945年3月，这种希望就已经实现了，苏联作协决定成立自己的“科学文艺委员会”，将科普和科幻小说的作者都纳入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奥布鲁切夫、亚历山大-奥巴林以及地理学家、斯大林奖获得者尼古拉-尼-米哈伊洛夫在内的著名学者积极支持，伊尔因成为创始成员。作家和电影导演，如谢尔盖-埃曾施泰因、亚历山大-卡赞采夫、什克洛夫斯基、鲍斯托夫斯基、列昂尼德-特劳贝格等人积极参加了委员会组织的公开和内部讨论。

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科学新诗学的最终确立而激发的欣喜很快就消失了。相反，委员会获得了“一个相互狂欢和隐瞒失败与错误的党派”的可疑名声[37]。这是由于委员会试图在其成员以及科普领域内树立权威时存在巨大的问题，因为不仅科学家们自己，而且老一代作家和批评家都赞成更“娱乐化”的科普观念。这些老一辈作家从年轻时就喜欢儒勒·凡尔纳或H·G·威尔斯这样的作家，因此他们也支持出版冒险题材的科幻作品。有一个事实对于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发展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那就是，在战后不久的几年里，每一个科学学科都缺乏任何既定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框架。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科学经历了一些学者所称的“科学战争”，或“斯大林主义民主的游戏”。当时每个学科都进行了长期的、旷日持久的内部和公开辩论，以便协商出一个在政治上适时的、在科学上有前途的研究框架，并作为党的路线予以颁布[38]。这些争论的典型特征是科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这些争论是在苏联与其前西方盟友之间迅速发展的冷战背景下进行的。对可疑的西方权威的“顺从”，不加批判地接受据称是“客观”的自然规律，或不加辩证的“唯心主义”或自愿主义的研究概念，是科学家可能面临的最严重的指控。遗传学和控制论作为伪科学被禁止，以及特罗菲姆-李森科臭名昭著的拉马克主义的确立，都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这些关于如何将科学概念化的外部冲突，加上内部关于审美形式的分歧，导致了长期的冲突和误解。这种情况是如此极端，以至于文化部长安德烈-日丹诺夫在1946年8月对作家安娜-阿赫玛托娃和米哈伊尔-佐夫琴科进行镇压，并封禁《列宁格勒》和《兹韦茨达》杂志（从而启动了“日丹诺夫时代”，这是一个在文化领域施加极端政治压力的时期）。这并没有改变基本的问题，而只是加剧了“纯艺术化幻象”所面临的“失败和错误”。结果，半年前还被赞誉为具有开创性并被提名为斯大林奖的小说或故事，往往突然被批判为“顺从”资产阶级的科学观念，“客观上是反革命的”[39]。

但渐渐的，持续不断的内部争执导致了一小批年轻作家和记者的崛起，他们在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文艺政客的支持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 *vydvizhentsy*——在斯大林技术情报统治下的“成就者”——在1930年代就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往往有在科研实验室和机构的工作经验。战后，他们不仅加入了作协，而且开始逐步为《文学报》或《共青团员报》等有影响的报纸、《星火》等流行的插图期刊，以及《环球》或《知识就是力量》等大众科学期刊工作。尼古拉-托曼、瓦迪姆-奥霍特尼科夫、维克多-萨帕林、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维克多-西廷、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和亚历山大-卡赞采夫等都是这样的作者，他们都出生于1905年至1916年之间。

1947年底，在作协秘书处的帮助下，这个小组通过了委员会的新章程，旨在将各种科普作品以

及科幻作品归入“富有诗意”的“科幻文艺”概念之下。新章程宣称，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为提高不同文学体裁作品的思想内容、教育价值和艺术水平而斗争。”[40]因此，根据这一教育目标，传统的科普以及苏联科学幻想（nochnaia fantastika）受到了攻击，因为它们忽视了科学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助长了科学的“庸俗化”[41]。正如该流派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娱乐性和悬念性的手段常常作为一种“危险的偏离”，旨在掩盖意识形态的无知和“非科学的方法”，而作家们必须认真考虑他们“以谁的名义”写作[42]。按照这样的教育目标，读者被视为被动的顾客，他们不加批判地认同文字，并有可能模仿所提供的一切。因此，如果向他们提供“一流的”纯文艺作品，“每一个苏联人，无论是知识分子、工人、民工、年轻人、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会阅读这些文学作品，这是理所当然的[43]。

新章程的思想内容对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具有核心意义，因为它把矛头指向了各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和把科学说成是聪明的“怪人”或疯狂科学家的造物[44]。这种新的思路使亚历山大-波波夫斯基的《受启发的探索者》（1945）和《以人的名义》（1948）、列夫-古米列夫斯基的《俄国工程师》（1947）和《技术大师》（1949）以及亚历山大-多甫仁科的“愚蠢”电影《米丘林：盛开的大地》（1948）等传记专著受到严厉批评[45]。在冷战开始的背景下，科学领域“俄罗斯优先”（russkoe pervenstvo）的主张加剧了“思想之战”。这种爱国-民族的话语在所有学科中占主导地位，是战后出版物与30年代战前类似出版物的主要区别。战前一般不存在这类话语，但现在甚至建立了新的书系，如关于革命前探险家的“俄罗斯旅行者”，或像《俄罗斯科学的灵魂》（1948）和《俄罗斯优先的故事》（1950年）这样的集合书系[46]。这种话语旨在发明一种专属俄罗斯的科学传统，并与俄罗斯成就的永久“纯文艺化”齐头并进，同时降低了所有自然或可能的科学障碍。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面对反动的沙皇帝国，在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热情支持下，为科学进步而奋斗。但面对帝国官僚机构束缚的学术代表，他们却无能为力。他们的斗争在1917年以后才得到正式承认，他们斗争的遗产终于在斯大林主义的现在得到了实现。

新章程中最不明确的部分是它要求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起初，一些评论家提议将科学工业题材的小说纳入这一类型，如瓦西里-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1946-48）。但人们逐渐同意，一部作品的“艺术主宰”（khodzhestvennoe masterstvo）应该包括虚构元素和科普元素的融合[47]。传统上，科普的目的是展示科学进步如何改变我们对自然和人类的理解，相比之下，科学文艺将揭示俄罗斯科学不变的“灵魂”，从而揭开自然规律的神秘面纱，并使之发生巨大变化。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界不再包含任何未解的秘密或非凡的发现，而只是一个被人类无所不能的殖民对象。伊维奇在1930年代将科学文艺定义为“发明的冒险”，因此被重新解释为一种典型的科学“预测”（predvidenie）的俄罗斯能力[48]。

从更普遍的意义讲，人们可以把这种转变概括为以下几点。旧有的“娱乐化”科普被指责为“庸俗化”，主要是在修辞上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而科学文艺则大体上否定了科学研究的所有复杂性和实验性，而强调其远见卓识的成分和思想上的“真实性”。这样一来，这一文体从根本上改

变了科学与虚构（或艺术）的关系：以往强调普及科学的权威性被抛弃，转而强调虚构的艺术性，借助于科学活动的“纯艺术化”，虚构将传达出科学努力的简单伟大和可以理解的真实性[49]。

到了40年代末，根据科学文艺委员会新章程的要求，随着斯大林主义后期“科学战争”的结束，这一文体终于可以宣布它的第一次成功。1948年秋，斯大林宣布了“重建自然的计划”，促进了按照委员会章程写作文学作品的政治要求的加强。于是，从1948年起，非虚构类图书开始获得国家小说界的最高奖（*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斯大林奖，将这类作品归入“科学文艺”体裁的范畴，使这一举措成为可能。有一次，连续有三篇“科学文艺”作品获奖。尼古拉-米哈伊尔沃斯的《在祖国的地图上》（1948）、瓦迪姆-萨福诺夫的《盛开的大地》（1949）和玛丽埃塔-沙吉尼安的《苏联亚美尼亚旅行记》（1950）。

从此，科学文艺被正式确认为严肃的、一流的文学作品，连《新世界》和《红星》这样“厚重”的文学期刊也开始刊载这类文学作品[50]。然而，这些作家越是成功地将科学文艺文本确立为关于科学与社会、未来技术发展和俄罗斯科学大师的专属写作方式，最初的前卫的、革命的、创造实质上新的“虚构性”科学诗学的冲动就越是消退。

可行性的幻象：斯大林主义晚期的科学小说

由于斯大林主义后期的紧张气氛，科学文艺类型的作品没有由受过科学教育的参与者、观察者写出想象人类未来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的“激动人心”的新故事，而是顽固地坚持教条式地粉饰二战后试图重建的灾难性国家所面临的灾难性问题。这一文体没有形成对现实的“新认知”，而是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当下的逃避主义梦工厂。众多的小说、故事和文学素描生动地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田野”，描述了一个被毁坏得无法辨认的“新地球”，描述了科学集体利用新发明的研究仪器开辟新的“通往深处的道路”，揭示自然界最后的秘密[51]，正如维克多-萨帕林所写的短篇小说《柔娅-维诺格拉多娃的一天》（1948）中的女主人公热情洋溢地说道：

他们来了，苏联技术的代表，新一代的工程师！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一切都是技术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把几十个自来水管的控制系统自动化，强迫汽车听从人类的声音——只要目的明确，能把人类从机械的劳累中解放出来，把他们解放出来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一切都可以做到。[52]

这种对技术和科学进步的无限可能性的热情，就是这种俄罗斯优先的新科学文艺诗学以及为共产主义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下真实的科学活动的核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任何一丝明确的对战后饥荒，对被破坏的工农业基础设施，或对因战争和古拉格而遭受创伤的人民的现实性的提法，都被扑灭了。

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科学诗学，在解冻时期被定性为对现实的“虚饰”，最典型的、影响极大的代表是弗拉基米尔-涅姆佐夫。涅姆佐夫是专业的无线电技术工程师，他在1920年代成为无产阶级文化诗人，然后成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热心追随者，之后他开始在阿列克谢-加斯特夫著名

的中央劳动研究所工作[53]。在30年代和战争期间，他注册了大约20项无线技术专利，1946年他进入作协。在斯大林时代后期，他每年至少出版两本书，发行量非常大。但斯大林去世后，在解冻时期，涅姆佐夫的大量科幻小说被认为写得太差，太无聊，以至于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只有一个人真正读完了他的小说，那就是在科幻小说领域以读过所有东西而闻名的人——根里奇·阿奇舒勒，他以根里奇·阿尔托夫的笔名发表小说。因而在解冻时期，涅姆佐夫也就作为当时所谓的“眼前目标的幻想”（*fantastika blizhnego pritsela*）的典型例子而闻名，这是专门描述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未来的科幻小说，其中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梦幻前景。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小说，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小说确实读起来很累——一般来说，所有晚期斯大林主义的小说都是如此——涅姆佐夫是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给虚构的科学现实涂上装饰的。例如，他的小说《仪器“SL-1”》在1947年至1951年期间出版了四版[54]。小说以乌拉尔山为背景，描写了年轻的工程师们正在建造一种“嗅觉增强器”，可以远距离“闻到”稀有金属的味道[55]。虽然他们未能在山下发现任何抢手的金属，但他们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叫奥梅金的孤独科学家，他用塑料材料做实验，并用塑料给自己盖了一整栋房子[56]。奥梅金自称是“塑料时代”（*vek plastmassy*）的“发烧友”，他坚信这个时代将取代现在的“钢铁时代”[57]。他盛赞塑料材料，因为它们可以随意成型、提炼、固化、变得有弹性。他向惊奇的年轻工程师们展示了他的塑料房子，它没有尖锐的边缘，稳定、不锈、完全透明。但它的墙壁可以随意变色，温度可以任意调节[58]。同时，这位科学家还在用超声波进行实验，以改变不锈钢的分子结构，或改变房子墙壁的物质和颜色，使它们不再漂白和老化。以这样的方式，他把当地的文化馆改造成了一间名副其实的奇迹之室[59]。

这段简短的情节概括已经暗示了涅姆佐夫作品中具体的“科学文艺”特征。首先，孤独科学家奥梅金这个姓氏在俄语中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一下子让人联想到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高尔基认为，这个文学英雄代表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典型现象——“多余的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是狭窄的，他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是多余的，他在其中为自己寻找一个舒适的位置，但没有找到，于是受苦、死亡，或与对他充满敌意的社会和解，或沉沦于醉酒或自杀。”[60]同时，“奥梅金”这个姓氏暗指希腊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欧米茄”。因此，如果这篇短篇小说也在形象意义上涉及斯大林政权的阿尔法和欧米茄，那么，奥梅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科学文艺”诗学的某种死胡同，或者至少是与它的美好未来相去甚远。

而且，发明即将到来的“塑料时代”的所有奇迹的不是热情洋溢的青年工程师集体，而是孤立无援的科学家，而科学家又反过来激励着青年。此外，小说将背景设置在西伯利亚乌拉尔的森林地区，也可能暗示了古拉格制度的遗址，被流放的科学家的形象也是如此，他过着孤僻的生活，不喜欢谈论过去，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乐观精神。

主人不想回忆过去，我从他的语气中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向我提到了一个最大的研究机构的

名字,在那里进行着复杂的新型建筑和内衬材料的研究,我们的经济需要这些材料。

“唉,我们的年轻人啊!”奥梅金叹息着说,“我真羡慕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乐观精神。生活是美好的,科学是光明磊落的,看到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你还没被油炸的公鸡啄过呢’。”他打了个寒颤,好像不想记起一些不方便的事情,但他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他继续说下去,笨重地坐在一张细长的椅子上。[61]

奥梅金的主要科学激情——一个新的塑料时代的开始,它将取代现在的钢铁时代——也可以被解释为对要克服的“斯大林时代”的直接暗示,而同时他的透明塑料房子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主义科学”的矛盾隐喻,这一概念在“科学战争”中已经形成、完善、固化、变得有弹性,并需要根据需要改变颜色[62]。

但塑料不仅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材料,如透明房子的形状所示,它可以随意变色和调温。“塑料时代”还暗指斯大林主义后期试图完全观察、控制和监视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主人公奥梅金本人——以他个人的挫败感和职业热情——让人联想到所有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古拉格的科学家。而在暗指普希金的《奥涅金》时,他也暗示了所有以前热心于社会主义计划的作家和支持者,他们在大恐怖中被谋杀,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尽管他们常常试图按照当前的政治路线来调整或“塑造”自己。其中包括如瓦尔拉莫夫这样的作家。

在涅姆佐夫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的,正是这种矛盾的隐喻底色,即使是最守成的作品也贯穿其中。换句话说,他们强调的透明性、可行性和集体性到最后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文艺概念的根本失败。

结 论

1930年代初,随着RAPP和1920年代所有其他文艺运动的解散,人们开始使用科学艺术文学一词。在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高尔基和马沙克等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家普及了“科学文艺”的概念,认为这是调和现代主义、前卫主义的科学革命梦想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梦工厂”设想的最全面的方法[63]。“科学文艺”这个词承诺不仅容纳前卫运动的内容,而且容纳它们的几种艺术形式和文学手段。但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都没有真正接受这一流派,所以它未能发展成为一种既定的、有效的普及科学或普及科幻小说的方式,它最终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从1934年底到1936年初。

但在战后时期,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这个词却得到了惊人的复兴。特别是在1948年到1953年之间,人们试图用这个词语形成一种新的自力更生的文学流派,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奠定了斯大林主义晚期关于一个没有冲突、以俄罗斯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的完美愿景。但正如涅姆佐夫的《仪器“SL-1”》所展示的那样,尽管这一时期最终实现了官方科学话语的基本统一,但即便是这一文体,也透露出斯大林主义晚期科学文化内部深深的矛盾不安。尤其是主人公的形象和他的科学发明,暗示了在光鲜的科学文艺表面下潜藏的暴力和压抑的现实。

所有关于科学新诗学的讨论,所有关于它的概念,以及所有归于它的著作,在后斯大林时代很

快就被遗忘了，因为所谓的解冻迎来了一种基于控制论、宇宙论和系统论的新的科学热情。在这个据称“医生受到尊重”而“词人受到忽视”的新时代，科幻小说这一类型经历了惊人的复兴。又或者“科学文艺”干脆就被丢弃了，许多以前支持那种“科学新诗学”的人们仍然积极地参与大众科学和小说的出版工作[64]。但是，当 C.P.斯诺宣称西方的《两种文化》（1959）——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时，苏联却在进行跨学科的努力，以期振兴“科学艺术文学”这一文体，使之成为一种“思想的戏剧”，一种“对知识的科学追求，一种缺乏历史和个性的无人区”[65]。达尼尔-达宁是这一短暂重生的最著名的倡导者。1960年，他出版了关于现代物理学的纲领性畅销书《陌生世界的必然性》，并在同年发起出版了年鉴《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66]。尽管该期刊能够持续四十年，但其24卷的内容从未在不同学科之间或科学爱好者圈子之外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讨论论坛。相反，它往往只是复制了斯大林主义前辈们的许多“纯文艺化的幻想”而已[67]。

注释

[1] Varlam Shalamov, “O moei proze” (1971), in his *Vse ili nichego: Esse o poezii i proze* (St. Petersburg, 2015), 115–42.

[2] Varlam Shalamov, “Nauka i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Front nauki i tekhniki*, 1934, no. 12:84–91), reprinted in his *Vse i nichego: Esse o poezii i proze* (St. Petersburg 2015), 51–84.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ll translations are by the author.

[3] 遗憾的是，从 1930 年代开始，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传记资料，也没有关于他从事科幻文学的思想和动机。即使是几十年后他关于这一时期的少数自传性声明，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这就更令人遗憾了，因为这种所谓进步的“新文体”，也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大工地和古拉格集中营中强迫劳动的残酷现实的一种隐瞒和粉饰。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在 1934 年编辑的《别洛莫尔运河》集体卷，许多以前的前卫作家都参加了这一卷。追溯“科学小说文学”与古拉格之间的这种奇特关系，需要单独写一篇文章。关于沙拉莫夫，见 Franziska Thun-Hohenstein, “Remembering the Gulag: Varlam Shalamov’s Poetics of Speaking and Being Silent,” in *Filologia, Memoria e Esquecimento*, ed. Fernando Mota Alvas et al. (Braga, Portugal, 2010), 71–95. On Gorky’s collective volume see Cynthia A. Ruder, *Making History for Stalin: The Story of the Belomor Canal* (Gainesville, 2003).

[4]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9); and John E. Bowlt and Olga Matich, eds., *Laboratory of Dreams: The Russian Avant-Garde and Cultural Experiment* (Stanford 1990).

[5] 鲍里斯·葛罗斯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解读，将斯大林主义描述为所有前卫梦想的实现。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只是颠倒了常见的概念，却没有对复杂的转变给出更深入的见解。See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London 2011).

[6] Catriona Kelly, “New Boundaries for the Common Good: Science, Philanthropy, and Objectivity in Soviet Russia,” in *Constructing Russi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880–1940*, ed. Catriona Kelly et al. (Oxford 1998), 238. See also James T. Andrews, *Science for the Masses: The Bolshevik State, Public Science,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in Soviet Russia, 1917–1934* (College Station, 2003).

[7] See Grigorii Mishkevich, *Doktor zanimal'nykh nauk: Zhizn' i tvorchestvo Iakova Isidorovicha Perel'mana* (Moscow 1986); and Boris Liapunov, “‘Zavtrak v nevesomoi kuchne’: Posleslovie,” *Iskatel'*, 1962, no. 3:157.

[8] See Boris Liapunov, *V mire fantastiki: Obzor nauchno-fantasticheskoi i fantasticheskoi literatury*, 2nd ed. (Moscow 1975), 49–50; and Andrews: *Science for the Masses*, 86–87.

[9] Matthias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Sowjetische Abenteuerliteratur und Science Fiction von der Oktoberrevolution bis zum Ende der Stalinzeit* (Cologne, 2014), 242.

[10] Eleonora A. Lazarevich, *Iskusstvo populiarnizatsii: Akademiki S. I. Vavilov, V. A. Obruchev, A. E. Fersman—Populiarizatory nauki* (Moscow 1960), 62–109.

[11] See Nikolai Kremmentsov, *Revolutionary Experiments: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in Bolshevik Science and Fiction* (New York, 2014); James T. Andrews, *Red Cosmos: K. E. Tsiolkovskii, Grandfather of Soviet Rocketry* (College Station, 2009); Michael Hagemester, “Konstantin Tsiolkovskii and the Occult Roots of Soviet Space Travel,” in *The New Age of Russia: Occult and Esoteric Dimensions*, ed. Birgit Menzel et al. (Munich, 2012), 135–50; and Igor J. Polianski, “Das Unbehagen der Natur: Sowjetische Populärwissenschaft als semiotische Lektüre,” in *Laien, Lektüren, Laboratorien: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 in Russland 1860–1960*, ed. Matthias Schwartz et al. (Frankfurt am Main, 2008), 71–113.

[12] Joseph Bristow, *Empire Boys: Adventures in a Man's World* (London 1991); Martin Green, *The Adventurous Mal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hite Male Mind* (University Park, PA, 1993); John Rieder, *Colon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ce Fiction* (Middletown, 2008).

[13]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Andrei) 或叶夫根尼·扎米蒂 (Evgenii Zamiatin) 在 1920 年代的早期讽刺和反乌托邦作品，也必须局限于这种常见的冒险科幻小说和娱乐性科普作品，并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处理。See Yvonne Howell, “Eugenics, Rejuvenation, and Bulgakov's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Dogness,” *Slavic Review* 65:3 (2006): 544–562; and Matthias Schwartz, “Das Ende von Petersburg: Utopie und Apokalypse in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des Fin de Siècl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1 (2015): 982–1000.

[14] 最著名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写的一部革命前小说《红星》(Krasnaia zvezda, 1908)。这部小说被布尔什维克赞誉为典范，只是在 1920 年代末，由于作者在普罗列特库尔特组织中的作用和他与尼古拉·布哈林的关系密切，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才沦为耻辱和遗忘。其他部分乌托邦小说，如Iakov Okunev 经常被引用的小说《即将到来的世界》(Griadushchii mir, 1923) 或Vadim Nikol'skii 的《一千年》(Chereztyysiachi let, 1927) 从未在大的科学大众杂志上发表，几乎

没有任何公众影响。关于波格丹诺夫小说的矛盾性，见 Phillip Wegner, *Imaginary Communities: Utopia, the Nation, and the Spat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 (Berkeley 2002);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182–85; an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167–89.

[15] Polianski: “Das Unbehagen der Natur,” 79.

[16] See Margarete Vöhringer, *Avantgarde und Psychotechnik: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 der Wahrnehmungsexperimente in der frühen Sowjetunion* (Göttingen 2007); Boris Gasparov, “Development or Rebuilding: Views of Academician T. D. Lysenko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 Avant-Garde,” *Laboratory of Dreams*, 133–50; Barbara Wurm, “Factory,” in *Revoliutsiia! Demonstratsiia! Soviet Art Put to the Test*, ed. Matthew S. Witkovsky and Devin Fore (Chicago 2017), 218–25; an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145–64.

[17] Schwartz: “How ‘Nauchnaya fantastika’ Was Made: The Debates About the Genre of Science Fiction from NEP to High Stalinism,” *Slavic Review* 72:2 (2013): 224–46.

[18] 据此，高尔基在《关于主题》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形象化的科学艺术思维”的新方式，这在1933年10月就已经开始了。See Vsevolod A. Revich, “Nauchno-khuozhestvennaia literatura,” *Bol'shaia sovetskaia entsiklopediia*, vol. 17 (Moscow 1974), 203–4. At first, Gorky and Marshak still used the attributes “scientific-fictional” or “fictional-scientific” randomly (Schwartz, *Expeditionen*, 292–303).

[19] 因此，马沙克和高尔基以一种非常相似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多年前针对传统儿童文学，特别是对童话类型的论点，指责童话不世故，使年轻读者远离现实。现在，两位作家又重复了这样的指责，反对科普中的发明世界和科幻小说中的梦幻逃避主义（nauchnaia fantastika）。关于20世纪20年代围绕儿童文学的争论，见 Marina Balina and Larissa Rudova, “Introduction (Special Forum Issue. Russ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anging Paradigms),”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49:2 (2005): 186–98.

[20] Samuil 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j literature,”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 1934: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1934), 31.

[21] 更多细节见 Schwartz, *Expeditionen*, 292–303.

[22] 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j literature,” 20–38.

[23] Boris Liapunov, *M. Il'in: Kritiko-biograficheskii ocherk* (Moscow, 1955), 74.

[24] 马利克出版社在1932年出版了约翰·赫特菲尔德设计的该书版本，书名为 *Fünf Jahre, die die Welt verändern* [《震撼世界的五年》]，显然是对约翰·里德关于十月革命的畅销书《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的戏仿。见 M.伊尔金[Il'in]，*Fünf Jahre, die Welt verändern: Erzählung vom großen Plan*（柏林，1932）。英译本以《新俄国的初级阶段：五年计划的故事》（波士顿，1931）出版。

[25] 据此，他以下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有类似的书名。《山与人：改造自然的故事》（*Gory i liudi: Rasskazy o perestroike prirody*, 1935）；《物的故事》（*Rasskazy o veshchakh*, 1936），是一本早期小册子的修订集；《机器的故事》（*Rasskazy o mashinakh*, 1949）；《你周围的故事》（*Rasskazy o tom, chhto tebia okruzhaet*, 1953）；《作为建设者的人民：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故事》（*Narod-stroitel': Rasskazy o piatom piatiletii*, 1955，遗作）。关于伊林的文学生涯，详见Matthias Schwartz, “Factory

of the Future: On M. Il'in's 'Scientific- Fictional Literature','" *Russian Literature* 103-5 (January-April 2019): 259-81.

[26] Aleksandr Ivich, *Priklucheniia izobretenii*, 2nd rev. ed. (Leningrad, 1935), 111–16.

[27] *Ibid.*, 117–26.

[28]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402–16.

[29] Marshak, "Sodoklad S. Ia. Marshaka o detskoj literature," 34.

[30] Mikhail Ia. Lapirovo-Skoblo, "Rech' prof. M. Ia. Lapirovo-Skoblo,"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 1934, 435.

[31] See Aleksei Tolstoj, Fedor Gladkov, Valentin Kataev, Nikolai Aseev, Ianka Kupala, Ivan Evdokimov, Panteleimon Romanov, Vladimir Bill'-Belotserkovskii, Mykola Bazhan, and M. Il'in, "Otvetnoe slovo pisatelei nashei strany (anketa 'bor'by za tekhniku')," *Bor'ba za tekhniku* 17–18 (1934): 9–15.

[32] 造成这种不感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科学文艺”这个名词按理说应该把以前低端的、二流的科普文体提升到真正的高端文学的高度，但大多数作家还是认为它不值一提。除此之外，因有关其任务和形式的激烈论争，以及对“一五计划”期间围绕科幻和科普的争论的回忆，都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33] Lev Gumilevskii, "Spiski knig vmesto izdatel'skikh planov," and M. Il'in, "Zamechaniia k planu Detizdata," both in *Detskaia literatura* 2 (1939): 53–59 and 51–53, respectively; Aleksandr Ivich, "Viktor Shklovskii v detskoj literature," *Detskaia literatura* 3 (1939): 54–58.

[34] For more detail see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331–40.

[35] Lev Gumilevskii, "Neumiraiushchaia fantazma," *Detskaia literatura* 8 (1939): 22.

[36] *Ibid.*

[37] 在 1951 年 3 月的一次内部辩论中，作家格奥尔基-图什坎是这样描述该委员会的（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567）。

[38] See Alexei Kojevnikov, "Games of Stalinist Democracy: Ideological Discussions in Soviet Sciences, 1947–52," in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ed. Sheila Fitzpatrick (London, 2000), 142–75; and Ethan Pollock, *Stalin and the Soviet Science Wars* (Princeton, 2007).

[39]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518–28.

[40]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literatury i isskustva (RGALI), f. 631, op. 15, ed. khr. 816, l. 86.

[41] Vasilii Zacharchenko, "Za vysokoe kachestvo knig po istorii nauki i tekhniki," *Pravda*, July 11, 1951, 2.

[42] *Ibid.* 另见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在关于科学文艺委员会方向的内部报告，RGALI, f. 631, op. 15, ed. khr. 787, l. 5.

[43] 根据瓦季姆-萨福诺夫在他的“苏联科学-小说文学”概念化中的说法，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 26.

- [44] Viktor Sytin at an internal discussion in May 1949,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 61.
- [45] See Zakharchenko, “Za vysokoe kachestvo,” 2;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18, ll. 5–6; *Ibid.*, f. 631, op. 22, ed. khr. 43, ll. 1–108.
- [46] 这套丛书由地理文学出版社 Geografizdat 于 1947 年建立，收录了 N.N. Mikliulkho-Maklai (1948 年) 和俄罗斯人类学家 I.I. Babkov 的 *Po Afrike* (1949 年) 等科学旅行家和环球旅行者的传记。See also I. V. Kuznetsov, ed., *Liudi russkoi nauki: Ocherki o vydaishchikhsia deiateliakh estestvoznaniia i tekhniki*, 2 vols. (Moscow, 1948); and V. Bolkhovitinov et al., eds., *Rasskazy o russkom pervenstve* (Moscow, 1950).
- [47] 见 1951 年 4 月关于该流派进一步发展的内部讨论，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42, ll. 92–98.
- [48] 在战后的文章中，伊维奇仍然保持着对“发明”艺术的兴趣，但现在他把它重新解释为心灵预测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能力。See Aleksandr Ivich, “Predvidenie,” *Znanie – sila* 7 (1948): 1–4.
- [49] 关于这些复杂的、部分矛盾的转变，详见 Polianski, “Das Unbehagen der Natur”, 92.
- [50]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23, ll. 19–23, 35–36.
- [51] See Aleksandr Kazantsev, “Na poliakh Kommunizma,” in his *Mashiny polei Kommunizma: Rasskazy o mashinakh, ikh sozdateliakh i komandirakh* (Moscow, 1953), 192–208; Viktor Saparin, “Novaia planeta” (1949), in his *Novaia planeta: Nauchno-fantasticheskie rasskazy i ocherki* (Moscow, 1950), 3–17; Vadim Okhotnikov, *Dorogi v glub'* (Moscow, 1950); and idem, *V mire iskanii: Nauchno-fantasticheskie povesti i rasskazy* (Moscow/ Leningrad, 1952).
- [52] Saparin, “Den' Zoi Vinogradovoi,” in *Novaia planeta*, 18–70, esp. 69.
- [53] 有关 Nemtsov 的传记请参见 Genadii Prashkevich, *Krasnyi sfinks: Istoriia russkoi fantastiki ot V. F. Odoevskogo do Boris Shterna* (Novosibirsk, 2007), 391–407. See also RGALI, f. 631, op. 22, ed. khr. 5, l. 50.
- [54] Schwartz, *Expeditionen in andere Welten*, 593–608.
- [55] Vladimir Nemtsov, “Apparat ‘SL-1’” (1947), in his *Nauchno-fantasticheskie povesti* (Moscow, 1951), 427–565.
- [56] *Ibid.*, 446–65.
- [57] *Ibid.*, 465.
- [58] *Ibid.*, 465–79.
- [59] *Ibid.*, 541–53.
- [60] Maksim Gorky, “Soviet Literature,” in *Problems of Soviet Literature* (by Andrei Zhdanov and others at the Soviet Writers' Congress 1934), (Leningrad, 1935), 25–69,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orky-maxim/1934/soviet-literature.htm>.
- [61] Nemtsov, “Apparat ‘SL-1’” 471. “ne kleval vas zharenyi petuch”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 “你至今没有任何不便”。

[62] 埃拉娜-戈梅尔曾对阿卡迪和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在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中类似的文学策略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某种“审查的诗学”，其中寓言和文字的解读交织在一起，不无问题。毫无疑问，它的一些特征已经出现在斯大林后期的作品中，比如涅姆佐夫的文本。参见Gomel, “The Poetics of Censorship: Allegory as Form and Ideology in the Novels of 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2 (1995): 87–105. 当然，透明的塑料房子也包含着对水晶宫的暗示，如在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出现的薇拉-帕夫洛夫娜的第四梦。关于俄罗斯思想史上的这一符号，也可参见 Natalia V. Kovtun, “On the Ruins of the ‘Crystal Palace’ or the Fate of Russian Utopia in the Classical Era (N. G. Chernyshevsky, F. M. Dostoevsky, M. E. Saltykov-Shchedrin),” *Journal of Siberian Feder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7:4 (2011), 1045–57, available at <http://journal.sfu-kras.ru/en/number/2433>.

[63] 在这个意义上，伊林可以作为鲍里斯-格罗伊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艺术”的论述的一个完美例子 (Groys,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London, 2011]).

[64] Boris Slutskiĭ, “Fiziki i liriki,” *Literaturnaia gazeta*, October 13, 1959. See also Loren R. Graham, *Moscow Stories* (Bloomington 2006); Matthias Schwartz, “A Dream Come True: Close Encounters with Outer Space in Soviet Popular Scientific Journals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n *Soviet Space Culture: Cosmic Enthusiasm in Socialist Societies*, ed. Carmen Scheide et al. (New York, 2011), 232–50; and Slava Gerovitch, *From Newspeak to Cyberspeak: A History of Soviet Cybernetics* (Cambridge, MA, 2002).

[65] “思想的戏剧性”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个特征，被达尼埃尔-达宁引用为一个定义性的说法。参见Mark Kuchment, “Bridging the Two Cultures: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Prose,” in *Science and Soviet Social Order*, ed. Loren R. Graham (Cambridge, MA, 1990), 327. 没有个性和历史（叙事）的科学散文的观念，直接指涉没有情节的散文的前卫观念和对事物传记的呼唤 (Schwartz, “Factory of the Future”).

[66] 许多长期支持科学文艺的人都积极参加了年鉴。除达宁外，该刊编辑部还列出了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活动家维克托-西廷和斯大林奖获得者尼古拉-米哈伊洛夫，还包括奥列格-皮萨尔热夫斯基和古生物学家、畅销科幻小说作家伊万-叶夫雷莫夫。关于该期刊的出现和建立，详见库奇门：《弥合两种文化》，329–34。

[67] 因此，库奇门特提到了这一文体的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带有“苏联社会等级结构的印记”；其次，它关心的是“以有利的角度介绍科学”，而不是“批判性地评价科学现象”；最后，它“是苏联文化机构的一部分”，没有遇到任何“严肃的公众批评”。所有这些特点都已经是斯大林后期的特点（同上，339–40）。

【札 记】

吕广钊：后新浪潮时代的英国科幻热

谈起英国科幻，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y，1797—1851）、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1866—1946）、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2008）、J. G. 巴拉德（J.G. Ballard，1930—2009）等等。这些作家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了不同的科幻运动，也象征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科幻小说的不同理解。可以说，自科幻诞生以来，英国科幻一直都是这一文学体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60到1970年代的科幻“新浪潮”（New Wave）之后，虽然以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为标杆的“赛博朋克”运动取得日益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英国科幻的生存空间，但后者并没有因此失去活力。得益于1980和1990年代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英国科幻迸发出了一股新的力量，并在世纪之交逐渐达到顶峰，史称“英国科幻热”（The British SF Boom）。

严格来讲，“英国科幻热”并没有明确的起始时间。有些学者将其追溯到1982年——著名英国科幻杂志《中间地带》（*Interzone*）在这一年创刊，并发展成为近些年英国科幻小说发表的重要平台。也有学者认为是1983年——科林·格林兰德（Collin Greenland，1954—）的学术专著《熵的展示：迈克尔·穆考克与英国科幻新浪潮》（*Entropy Exhibition: Michael Moorcock and the British “New Wave” in Science Fiction*）的出版标志着风靡一时的“新浪潮”运动悄然落幕，英国科幻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英国科幻热的起始时间还有许多候选年份，比如1987年（伊恩·班克斯（Iain M. Banks，1954—2013）出版了其“文明”系列的第一部小说《腓尼基启示录》（*Consider Phlebas*））、1990年（小说《差分机》（*The Difference Machine*）将“蒸汽朋克”（Steampunk）这一体裁展示给了全球的科幻读者，故事以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作为叙事背景，展现了英国元素在科幻作品中蕴含的独特张力）、甚至1995年（第53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格拉斯哥举行）。但不论如何，没有人否认，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英国科幻迎来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中期。而为了研究这一科幻热潮，我们首先必须要充分了解该时期英国的政治与文化背景。

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她领导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减少对市场的管控力度，加快英国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提高社会效率，鼓励民众“自力更生”。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撒切尔的改革，英国才从“石油危机”以来的经济滞胀中逐渐恢复，成为欧洲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但同时，这些旨在促进经济的措施却严重侵犯了英国左翼阵营与无产阶级的权益。随着诸多工厂、煤矿、港口的关停，英国制造业首当其冲，大批熟练工人下岗失业，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NUM）在1984年春天宣布罢工，以此抗议撒切尔对煤炭行业的打击。但是，撒切尔对此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由于政府的镇压以及工会内部的分裂，罢工在1985年宣告失败。这一事件也被视为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府里程碑式的胜利。自此，英国左翼阵营备受打击，工会的政治权利被永久削弱，新自由主义成为英国

政治上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撒切尔之后，梅杰的保守党政府（1990—1997）以及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1997—2007）在很大程度上顺承了以市场与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布莱尔甚至修改了工党党章，将第四条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相关论述改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享受的权利要反映我们对社会的责任”）。

虽然在1980年代英国左翼阵营备受打击，但得益于深厚的社会与群众基础，英国左翼人士还是在很多非政治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力，而科幻小说所内在的独特叙事潜力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英国左翼思潮的根据地。伊恩·班克斯设想了一个名为“文明”（Culture）的后资本主义乌托邦，并通过后续的一系列作品，将其打造一个细节丰满、自成体系的无政府社会。肯·麦克劳德（Ken MacLeod, 1954—）则在自己的“坠落革命”四部曲（Fall Revolution Quartet, 1995—1999）中描绘了两个诉诸“左翼自由无政府主义”（left-libertarian anarchism）的社会，“诺伦托”（Norlonto）以及“新火星”（New Mars），以此批判撒切尔的强势政府以及市场“去监管化”的进程。与之类似的是，史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 1957—）的“泽利”系列（the Xeelee sequence, 1991—2015）、格温妮丝·琼斯（Gwyneth Jones, 1952—）的“阿留申”三部曲（the Aleutian Trilogy, 1991—1997）以及柴那·米耶维（China Miéville, 1972—）的“巴斯—拉格”三部曲（the Bas-Lag Trilogy, 2000—2004）也都体现了对于市场竞争与资本主义的强烈批判。虽然英国科幻热也呈现出了像“新太空歌剧”与“新怪谭”等新的叙事体裁，但其核心诉求仍然是在“历史终结论”的语境下，想象并建构“非资本主义”的或然可能性。

英国科幻热最后的高光应该是2005年——世界科幻大会在十年之后再次来到格拉斯哥，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提名的五部作品全部来自英国科幻作者，分别是苏珊娜·克拉克（Susanna Clarke, 1959—）的《英伦魔法师》（*Jonathan Strange & Mr Norrell*）、伊恩·麦克唐纳（Ian McDonald, 1960—）的《诸神之河》（*River of Gods*）、查尔斯·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 1964—）的《钢铁朝阳》（*Iron Sunrise*）、柴那·米耶维的《钢铁议会》（*Iron Council*）以及班克斯的《代数学家》（*The Algebraist*）。此后，随着英国文化环境的变化，英国科幻热作品中过于强烈的政治元素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争议。正如它的开始一样，英国科幻热同样也没有公认的终点，其文学影响力持续至今，但很多人仍将2013年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这一年，英国科幻热的代表人物伊恩·班克斯因胆囊癌不幸去世，而在同年的雨果奖评选中，英国科幻也遭遇滑铁卢，这标志着科幻领域的又一次时代更替。

虽然“英国科幻热”已经不再像上世纪末那样引人瞩目，但其中蕴含的强烈左翼思潮仍然是我们理解彼时英国政治环境的重要参考。在资本与市场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需要珍视科幻作品中体现出的左翼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呼应詹明信提出的“乌托邦欲望”，并且在历史终结论的阴影下，探求其它的政治与社会可能性。

【动 态】

《中国轨道号》吸引关注也引发争论

搁笔多年之后，吴岩重回长篇科幻创作领地。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中国轨道号》于2020年12月出版。小说刚一出版，马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文艺报》和《科普时报》都拿出大量篇幅，发表多篇书评。发表书评的报刊还包括《中华读书报》《文学报》《深圳特区报》《深港书评》等。

崔昕平在《中华读书报》2月1日发表的《科学之美盛放的童年景象》中认为这部小说“作品的新异气息与精准的儿童文学视角令人眼前大亮”。周群在《科普时报》2021年2月5日发表文章并于2021年3月24日接受《文艺报》采访，两次谈到这部科幻小说的教育价值。她在采访中指出：“结合《中国轨道号》所呈现出的儿童观和其中的科幻元素，我认为，作者创作的底层逻辑是着眼于儿童的全面发展。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儿童的理解、尊重与呵护，也释放出了成年人之于儿童一代的最大善意和美好祝愿。”《儿童文学》前主编徐德霞指出：“这是近年出现的原创儿童文学中的又一部精品力作，是一部内涵丰厚，具有文学大气象之作。它集儿童性、文学性、科学性于一身的，是文学气韵与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是儿童生活与成人生活高度融合，是轻与重、大与小、深与浅拿捏得很好的一部力作。”

《科幻世界》副总编辑姚海军也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轨道号》是少有的让我一口气读完的小说。以小主人公为核心的几组人物的命运和‘中国轨道号’那壮阔的梦想一直牵引着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特殊背景下，还有哪些人比科学家和他们的孩子的命运更令人牵挂？还有什么会比一个似乎只能存在于梦想之中的亮丽未来更让人期待？”在报刊发表书评的作者还包括原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和另一位航天专家饶骏。吴季在书评中特别提到作品充满童心，而且，没有按照今天的科技去还原昨天是很好的写法。饶骏则指出：“孩子，一直是中国轨道的希望，是传承，是未来。而未来的中国轨道，必跨越浩瀚星空，无远弗届。”作家安武林也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指出，“吴岩的《中国轨道号》，是献给一代航天人为飞天梦想所付出的努力而唱的赞歌。我们每一个巨大的科学成就，都是一代一代人艰苦努力所获得的。对于今天享受着科学成就的孩子们来说，更需要聆听他们的故事。回忆过去，是为了珍惜今天。回忆过去，是为了勉励我们去为明天而努力而奋斗。”韩松在《文学报》2021年4月1日的文章中指出：“这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和巨大价值。现在对那个远去时代的记忆已经非常稀缺了。仅仅是尝试去记住都需要勇气。因此我觉得《中国轨道号》在当代中国科幻或者当代中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刘慈欣也在《文艺报》专访中指出：“上世纪70年代确实有广泛而纯粹的理想主义情结。在科学技术方面，国家可以集中全部力量去办一件事情，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科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例如‘两弹一星’等成就。但另一方面，那并非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理想时代，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它并不很值得回忆。但不论处于何种时代之中，每个人的童年

都有美好的回忆，当回忆起童年的时候，肯定会加上很多自己的生动想象。《中国轨道号》把科学幻想叠加到真实时代中，构成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处于真实和虚幻之间的想象世界，让人回味和感慨。其实，书中出现了很多当时不可能出现的科技，比如生物计算机、红微子、新的卫星观测技术等，这种把极其超前的技术科学用科幻想象放置在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构成了独特的科学幻想的世界。”

从现有的《中国轨道号》评论中，也看到一些不同意见，分歧主要在于小说到底是儿童文学还是科幻文学、是给儿童读者看的作品还是给成人读者看的作品，以及是否属于“科普型”科幻。多数人都指出，这篇小说具有儿童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双重特色。对于读者对象，已经有很多六零后和七零后表示，他们非常喜欢这本书给他们带去的回忆。刘慈欣在《文艺报》专访中指出：“我觉得，少儿读者很难体会到其中复杂的历史感受和历史情结，而《中国轨道号》所传达的内涵要比小读者们能读出来的复杂和深邃得多。因此我认为《中国轨道号》不是少儿科幻和科普性科幻作品，虽然承担有少儿文学的功能，但其内涵复杂得多。”韩松则在《记忆决定未来》中指出：这本小说“是成人文学，是当代中国文学难能可贵的一大收获。对它的解读和感悟可以有非常之多，这种多元复杂性正是新时期中国科幻的主要特征”。将小说归类为科普型科幻的是作家董仁威。他举例作品学习了老一辈科幻作家的写作方法，而老一辈科幻作家大都是科普型的，以及小说中确实有不少科学和科学家的活动。吴岩自己则指出，把科幻小说当成科普读物是危险的。他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要不断询问和反思其中的各种现象，从社会生活到“科学知识”。他在参加周群组织的线上教师读书会和学生读书会的时候都明确指出，科幻的阅读，须要建立在对本文本的不断去探寻、质疑和发现的基础上才行。

到当前为止，在报刊发表书评的还有罗明军、付昌义等，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共号发表过评论的还有宝树、电子骑士、潘海天、西夏、赵海虹等。（丁倩）

2020年秋季开始，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下属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邀请黄鸣奋担任高级访问学者，为期一年。黄鸣奋教授在访问期间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科幻电影。目前，他已经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论文，还有一部科幻电影方面的著作将会在明年出版。据悉，目前在这个中心访问的还有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生李锦华。

2020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院和剑桥大学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事》（AI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线上研讨会，哔哩哔哩（bilibili）同步直播。科幻作家、博古睿研究员郝景芳主持，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和学者三丰主题演讲，回顾中国科幻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叙事。在讨论部分，科幻作家夏笳、宝树、陈楸帆、飞氲就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相比，有什么特点？”等话题展开讨论。此项互动是该研究院的系列AI叙事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聚焦从中国视角、东方智慧观照人类变革和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引领了第四次科技

革命，中国科学家和思想家参与全球对话至关重要；融入当代性的东方智慧如何破解今天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2020年12月19日，受日本筑波大学大泽广隆（Hiroataka Osawa）邀请，吴岩和三丰参加了“科幻原型法和未来学大会”（SF Prototyping Futurology Congress - World）线上研讨会，参会的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与想象力中心助理主任 Ruth Wylie和来自日本的两位专家。与会者探讨了科幻叙事作为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的原型方法的理论可能性，并就其在各国的实践进行了沟通交流。

（陈发祥）

《科幻研究通讯》可在久隆计划网站下载：
<http://www.sfjiulong.org/newsletter>

中国科幻学会（筹）

本期责任编辑：李广益、吕广钊
电子邮件：liguangyi@cqu.edu.cn